

二十一世紀評論

轉變中的大學之道

大學與公共：在不確定年代的思考

項飆 彭麗君 黃山

2026年4月9日，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以「大學與公共：持守我們的共同關切」（“University and the Public: Staying with Our Common Concerns”）為主題，邀請項飆和彭麗君兩位學者展開一場公開對談。活動的起因是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新近開辦公共人文學文學士（BA in Public Humanities）課程，它的宗旨是把批判性的理論訓練與文化實踐、知識轉化，以及社群營造結合，意在培養能回應當代社會需要的文化中介者與生產者。無獨有偶，項飆及其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的團隊近年以「共同關切」（common concerns）為進路，探索專業社會科學研究介入公共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儘管社會背景和機構形態不同，雙方具有相通的問題意識：在面臨諸多變局的當下，大學需要更主動地重新定位自身，以回應時代的需要。是次對談由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後研究員黃山策劃和主持，以英語進行；本文基於李祖喬教授提供的中文轉錄稿，由黃山編譯，嗣經兩位講者增補而成。

項飆，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曾任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他關於中國、印度及亞洲其他地區遷移與社會變遷的研究，在學界內外均有廣泛影響，代表作包括《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與《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2018）。作為近十年中國最受矚目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項飆透過大量訪談、隨筆與公共活動，提煉出「附近」等廣為流傳的概念，並在學術與公眾之間自覺開闢多重介面，探索如何在其中生產為大眾所可感、可用的概念與知識。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項飆近年與中國內地高校學生及海外留學群體互動頻繁，並在此基礎上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提出建言，也與廣州美術學院推動相關教學實驗。其「知識行動」因此日益受到國際學界與公共文化領域的關注。

彭麗君，香港中文大學卓敏文化及宗教研究教授，研究橫跨電影與視覺藝術、批判理論、法律人文與思想史等領域，既長期投入現當代中國研究，亦持續關注香港本土議題。其思想計劃的核心，在於探究「多」與「一」之間的張力：文化與政治、複本與母本、多元與統一、民主與主權。她的研究屢獲國際肯定，英文近著《一統與多元：中國主權的邏輯》（*One and All: The Logic of Chinese Sovereignty*, 2024）入圍 2025 至 2026 年度政治研究會（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麥肯齊書獎（W. J. M. Mackenzie Book Prize）。本次對談中，彭麗君選取「留」（staying）作為關鍵詞，並以香港近年的社會狀況為思考錨點。這一選擇一方面是對「大學與公共」這一命題的具體回應，另一方面也延續了她試圖跳脫既定框架，思辨香港處境的努力。

一 變化中的大學與多元的公共

黃山：我們在此時此地談論「大學與公共」這一題目，讓我想到兩件事。其一，是近來各類全球大學排名剛剛更新，各校為了守住或提升名次，往往投入大量資源與精力。然而，這些排名與我們身處其中的公共生活究竟有何關連，對許多人而言其實並不清楚。大學愈來愈頻繁地被放進全球競爭、績效評估與制度治理的框架裏，但它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未必能在這些指標中顯現出來。其二，是今天這個場地本身。這場對談原本在一間普通教室裏進



黃山博士、項飆教授、彭麗君教授（圖片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提供）

行，後來報名人數遠超預期。我知道聽眾中不乏有人是專程趕來香港，只為聽到這場對話。於是我們不得不把場地改到中大崇基學院禮拜堂。這個略帶意外的安排，反倒成了今天討論最好的註腳：在此刻的香港，「大學與公共」並不是一個只屬於學院內部的抽象命題，而是一個仍然能夠把人召喚到一起共同思考的問題。

我想先請兩位各自作一個開場陳詞：從你們為本次對談提供的關鍵詞說起，我們應該如何重新理解「大學」與「公共」之間的關係？

(一) 何為「共同關切」？

項飆：崇基教堂是一個不尋常的空間。它在大學之內，同時又超越大學。這樣的空間正適合我們今天的討論。

教堂這個空間提醒我們，「公共」一詞含義豐富，而且公共本身也在不斷變化。正如大學排名如今被愈來愈認真地看待，它當然是公開的，具有公共效應，但那種「公共」跟我們此時此刻在這裏所感受到的「公共」，並非同一回事。因此，在這個空間、我們與在座聽眾之間的討論，是一種公共；那個廣為傳播的大學排名也是一種公共。假如只以單一版本的「公共」來界定我們的生活，那是非常危險的。擁有多元形態的公共至關重要。我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必然是多面向、多維度疊加在一起的。這座教堂是特定宗教傳統信眾的公共空間，但今天我們討論的內容顯然與宗教無直接關係。這說明，公共的面貌隨時可以從一個目的轉向另一個目的。換言之，公共的本質就是開放、靈活。

正是公共的這種流變不居的特質，促使我和同事去構想「共同關切」取徑（common concerns approach）。所有社會研究在某種意義上都涉及共同關切。我們今天特意提出這個說法，不是宣稱自己在做甚麼全新的事，只是想讓社會研究切實回應公眾的訴求。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公眾的構成和訴求與過去已大不相同。2025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61.3%^①，我相信這個比例在香港可能還要更高。而在全球範圍內，這個比例也達到43%^②。這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公眾，他們在本質上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截然不同。那個時代，社會科學剛作為一門專業建立起來，大學也才開始成為公共建制。公眾既已發生如此根本的變化，公眾所需要的東西自然也迥異於一百年前。

今天的公眾，比方說在座的諸位，可能並非從事研究、也不是在攻讀學位，但是不管你們在哪個行業工作，你們對生活、對社會都有許多疑問和思考。你們未必需要研究者提供某種「最終答案」，因為你們想以自己的方式思考自己的問題。你們真正需要的，是以更好的工具來促進自身的思考。

這意味着研究的範式必須有所轉變。舊有的範式建基於一套打包好的明確答案：一個精緻的框架，配以清晰的定義，讓人一口吞下，如同一張圖表

可以看穿一切。這種想像在我看來已不再合適。或許更切合當下需要的，是那些能與你的感受產生共鳴、與公眾的經驗產生共鳴、尤其與你的關切產生共鳴的概念。「共同關切」取徑嘗試的正是這樣的工作。

這裏的「共同」並非意味着我們在生活中擁有同樣的關切——當然不是。我們各自的處境不同，關切也必然是因人而異。然而，任何個人關切，只要是基於具體經驗而不是被憑空捏造出來的，都會與他人的關切發生交疊。作為人類，我們的生命經驗總是彼此關聯，也共享許多基本需求。

因此，「共同」也同時是一個過程——一個「使之共同」(commoning)的過程。這種共同性通過研究和互動而逐步達成。通過這樣的過程，我那非常個人的關切，變成了你也能辨認的東西，變成了你我可以坐下來交談的話題；而你由此對自己的關切，也生發出新的理解。這就是「共同關切」取徑的要旨。

(二)「附近」的切身性和行動性

項飆：舉一個例子：「附近」這個概念。「附近的消失」是一種很多人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即刻辨認的經驗。它牽繫着我們的感受、我們對孤獨和隔絕的憂慮，或者與人交談時那種莫名的不自在。從這個切身的主觀感受出發，我們可以追溯到歷史脈絡和政治經濟結構——我們的生活空間是如何被塑造的。「附近」這個概念可以視為「共同關切」取徑的一個實例。同時，它不只是要描述既有現象，而是提供了一個起點；附近是你可以把握的，然後由此展開行動。

說實話，「附近」這個概念根本不是我的發明。我在一次訪談中隨口提到「附近的消失」，並沒有想太多。反而是你們(公眾)鼓勵我進一步思考。我是在收到大量回應和評論之後，才覺得其中確有值得深究之處。那麼裏面究竟有甚麼？我認為至少有兩點。第一，「附近」是極其切身的、經驗性的。附近不是一個社區，不是一個固定的空間。無論你走到哪裏，你的附近始終跟隨着你。它直接環繞你、觸及你的身體，因此它是非常切身的，不僅僅是一個觀念。它是一種不易被形式化、也不易被人工智能(AI)所替代的東西。而我想，這恐怕正是很多年輕人的感觸所在。他們想更多地談論的，是那種真切的存在感，或者說那些細膩的、穿過身體的經驗。

與此相關，我認為「附近」這個概念的第二重潛力在於：它是你伸手可及的東西，是你可以據此行動的東西。「附近」這個概念在新冠疫情期間之所以格外引起共鳴，並不僅僅因為人們被封鎖在家、不得不面對和依靠周遭的一切來求存——那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疫情期間，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深切地感到：我如何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一切都那麼不確定，甚至都無法理解。那是一種與世界、與自身存在深深疏離的感覺。由此而生的是一種渴望——讓生活重新回到自己的掌控之中，而「附近」或許為此提供了一個潛在的切入點、一個起步的支撐。

所以，它不是一個你用來建構理論、描繪世界真相的概念。它是一個工具，不僅用於思考，更用於激發某些感受、喚起你對某些方向的關注。「附近」本身就是公共的一個非常具體的構成。

(三)「留」：時間性的創造力

彭麗君：謝謝項飆這番極富啟發性的發言。我想在座很多人之所以受到他的思想吸引，首先是出於一種切身的認同。我們知道，「附近」在今天的世界是一個亟需的概念。它不僅關乎我們對周遭環境的關心，更在於我們需要那個環境為自身提供某種意義，尤其是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裏。「附近」的力量正在於此。

今天我想引入一個不同的概念。項飆的概念主要是空間性的，它關乎圍繞我們、我們能夠觸及的社群。我想引入的是一個時間性的概念「留」(staying)，或者說「駐留」、「留守」、「與困難共處」。我非常同意項飆所言，「附近」確實可以讓我們重新掌控自己，但當中的自信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必須通過長時間「留」在「附近」才可以養成。

「留」是一個時間性的概念，它與「附近」這個空間性概念形成對照。「留」意味着與特定的人和事相處、在其中生活，歷經較長的時間。雖然最初設定的目標在這段時間裏未必總能達成，但堅持駐留在一個特定場所的那份投入，往往會結出意想不到的果實。借助時間的魔力，持續的過程和實踐逐漸凌駕於具體的目標之上，最終孕育出全然不同的東西。在我看來，「留」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力。



彭麗君教授認為，「留」是一個時間性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力。（圖片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提供）

我們可以拿「留」與人工智能以及我們整個當下的環境作一對比。人工智能為棘手的問題提供即時的答案，讓我們省卻大量的研究時間。這在某種意義上當然是好事，畢竟我們都感到時間不夠用，但它同時也阻礙了我們投入那種精細綿密的研究。人工智能只能依賴現有的知識。在一個人工智能讓初步的解答唾手可得的時代，我們犧牲的是生活和歷史中固有的含混與幽微。

我們愈是依賴機器來解決問題、建構世界，就愈是深陷疏離。現代化的特徵之一便是人類依賴機器來處理問題和進行智力勞動，但我們應時刻警醒：不要把對人的理解與對人的互動割裂開來。理解與互動理當合而為一，而我們卻把它們分開了。作為社會性存在，我們需要與人連結、共同工作，才能獲得力量。

我們可以拿「留」與比方說「關係」來做比較。關係的建立需要持續不斷的溝通、不懈的實踐以及反覆的試錯；學習需要時間。以學徒制為例，那是一種手把手的、嵌入情境的社會過程，與透過人工智能獲取知識形成鮮明對照。後者是即時的、孤立的，缺乏那種讓學習者真正將知識內化為己有所必需的時間性操練。學徒專注於在實時觀察和模仿專家的過程中習得精湛技藝，同時也講求技能的實際應用。美國社會學者桑內特 (Richard Sennett) 展示了一點：透過長期浸淫於手工技藝和傳統之中來學習匠藝，塑造的不僅是成品，更是匠人自身。匠藝關乎的是存在本身^③。

(四)「留」是一種修煉

彭麗君：我們需要與自己共處，也需要與他人共處。一個人需要時間才能認識自己，同樣需要時間才能傾聽和理解另一個人。社群正是由此而來，這也是為甚麼社群建設對個體的存在如此重要。

與他人長時間相處，會在主體之間的脈絡中帶來自我反思；在與他人延展的共處中，我們逐漸發展出察覺自身偏見的能力。人類生活的豐盈，連同它所有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隨時間徐徐展開，是無法被快速捕捉的。尤其在當代世界錯綜複雜、充滿威脅和不確定性的條件下，我們需要與人共處，才能真正理解我們身處的困境。

顯而易見，「留」意味着要與他人共處。這絕非易事，而是異常艱難的。互動可能令人感到疲累、不適、困難。而且我們必須承認，近在咫尺的人往往正是我們最容易心生厭煩的人。然而，日常生活中那些不便、失望、摩擦和磕碰，恰恰是建立持久社群和關係不可或缺的養分。「留」也是一種修煉，訓練我們如何面對舒適或不適的相遇、選擇擁抱或拒絕，同時深知共同生活中總是伴隨着不適與不便。

我們可以把觀察的目光從人轉向物。讓我舉一個觸及許多香港人內心的例子。距離這裏不遠處 (大埔宏福苑) 最近曾發生一場火災，此後一直有聲音要求在香港建築工程中以金屬棚架取代傳統的竹棚架。金屬棚架確實

具有相當的剛性，耐用、防火、承重力高，且精度優於竹材。金屬棚架可以說是一套從別處引入本地情境的方案，背後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計算和規程。

反觀竹子，柔韌、經濟、無需依賴重型設備，在本地環境中的使用靠的是不斷的適應和調整。竹棚架在香港建築工地使用了幾十年，早已與這座城市獨特而多樣的都市肌理建立起深厚的親和感。技藝嫺熟的搭棚師傅能夠因地制宜地彎折竹枝，使之契合窄巷、鬧市、老舊樓宇、傳統表演場地等種種環境，令竹棚架成為建造、更重要的是修補城市環境的理想材料。所以關鍵不在於竹子本身的物質屬性，而在於竹棚架長年累月地「留」在那些建築物之上、深嵌在城市環境之中，同時環境也反過來依附於對竹棚架的使用。正是這種相互纏繞的駐留，使它成為這座城市存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哈拉維 (Donna J. Haraway) 在她的名著《與麻煩同在：在觸生世中建立親緣》(*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中提出了「與麻煩同在」(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的概念，敦促我們把面對的種種麻煩視作「糾纏」(entanglement)，而糾纏就是生命本身。「與麻煩同在」就是尊重生命。在生命中，個體總是作為集體共同生活、共同製造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從對地球生命的研究出發，她相信在這個複雜的、動態的、具回應性的生物世界裏，新型的細胞、組織、有機體和物種主要是通過與陌生者之間長久的親密共存而演化出來的。在生物的世界裏，物種的成員不僅保護自身同類，也從跨物種的共棲中獲益^④。

(五)「留」的政治學：在地與全球

彭麗君：接下來讓我做一個歸納。「留」的政治學 (politics of staying) 所回應的兩組脈絡：第一組是我已大致提及的在地 (local) 與全球 (global) 之間的緊密關係。對我們來說，在面對全球環境的不確定時，認識到並記住這一點日益重要。「留」在定義上不等同於「在地」，但它必然是環繞在我們身邊的，因為我們並非飄浮不定。而我們所處的全球環境是一個充滿糾纏的環境，諸多在地現象相互交織。

通過深入駐留在個體的具體訴求之中，我們得以培育同理心、建立信任，並集體地應對更宏大的全球危機。我相信，在地的駐留行動具有更深遠的全球意涵，尤其是面對我們正在遭遇的種種「終結」論述的威脅。當世界在各種關於人類毀滅與末日的話語中似乎不斷崩解，滋生犬儒與麻痺，我們堅持與個體的不幸和具體的事物同在，能夠幫助我們獲取智慧和勇氣，在惡化的處境面前不至於被失敗主義所吞噬。

第二組脈絡關乎香港。我們此刻身處的這座城市，在過去數年間有數十萬居民離開，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我一直希望有時間去理解我們當中那些選擇留下來的人。

離散者 (diaspora) 的位置對於豐富我們的文化經驗、身份和歸屬感固然彌足珍貴，但為那些留下來的人發展一套理論同樣至為重要。這或許是因為「留下」的位置——有時候我們稱之為「留守」——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一種維持現狀的、不行動的、不做決定的姿態。相對於那些主動選擇離開的人，有一種預設認為離開才代表真正的抉擇。但「留」給予個體時間，讓彼此之間建立信任。在後社運年代的香港，「留」不應被理解為「離開」的對立面。相反，「留」是對香港處境的一種確認——我們經歷了政治格局的劇烈轉變，但人們仍然可以選擇前來、離開或留下，從而讓這座城市依然維持着對新的相遇的開放。我認為，這種對所有想前來的、想留下的、想離開的人的開放，對於那些想堅守歸屬感和身份認同的人同樣重要。

二 年輕人的處境與鉅變中的高等教育

黃山：談大學與公共生活，自然離不開年輕人的處境。而兩位思考的立足點並不相同：項飆的觀察，直接來自中國內地的年輕人，以及他任教的歐洲大學與研究機構；彭麗君的思考則更扎根香港，尤其是她在中大推動「公共人文學」的經驗。我想請兩位談談：這些不同的場域如何塑造了各自的視野，又如何反過來牽動學生的志向，以及教學所能打開的可能？

項飆：確實，我的觀察在很大程度上建基於與年輕人的互動。首先，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在過去三十年間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啟動了一場極為迅猛的大規模大學擴招計劃，我們稱之為「高校擴招」。但這裏有一個弔詭之處：大學敞開了大門，招生規模急劇膨脹，更多人開始關注大學，包括許多來自農村的低收入家庭，他們的孩子終於有機會上大學了；然而，大學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卻依然故我。本來，那麼多人湧入大學，大學本應從精英教育轉型為更貼近實際的教育，但事實上恰恰相反。高等教育大眾化發生之後，每所大學反而在更激烈地相互競爭，力圖在國內乃至國際排名中保持高位。如何保持高排名？跟着排名的邏輯走就好了——通過這個手段來捍衛文憑的價值。

我並不否認大眾化教育是一項巨大成就。但高等教育具體的政治經濟學製造了年輕人今天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這也是我開始思考大學角色的起點：公眾的需求在變，教育的政治經濟結構在變，那麼大學應當如何重新定位自己與公眾的關係？尤其是在教學領域。

這裏補充一點。我不在美國生活，但如果你看看美國發生的事，會發現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悖論。毫無疑問，美國的社會研究在世界上是最先進、資源最充沛的。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這樣一個事實：一個擁有全球最先進社會研究的國家，正在經歷解體，正在經歷深重的社會危機？

我知道某些地方已經有政治人物在質問：我們為甚麼要聽社會研究者的話？你看美國，投入那麼多經費，成了社會研究的世界領袖，結果社會變成這個樣子。社會研究和社會生活之間究竟是甚麼關係？

那麼，是美國學者問錯了研究問題嗎？是他們有甚麼誤解嗎？不！他們的問題都非常尖銳——關於不平等、種族主義等等，他們的分析在方法上、理論上都很有位。問題是：你可以說出非常正確、但不產生任何社會效應，甚至產生負面效應的見解。公眾經常覺得你只是在自說自話，並沒有觸及他們真正關心的具體問題。他們覺得學者在以精闢的口氣來教導他們，讓他們反感。美國的情況提醒我們為甚麼「大學與公共」的問題如此重要。

彭麗君：我想在座很多人都與大學有某種關聯。讓我從學術的角度出發，舉一個非常直接的例子，說明我們正面臨的危機；而且說句實話，我們當中恐怕不乏這樣的人。有些學者用人工智能作為輔助甚至實質的內容生產者來撰寫論文，然後把論文投給某些期刊，尤其是那些掠奪性期刊。它們會製造虛假的審稿意見，很多人知道，它們通過人工智能生成所謂的匿名評審，再把意見丟回給你；你再用人工智能修改，提交修訂稿。你用研究經費支付版面費，然後這篇論文就發表了。而讀它的人（如果真的有讀的話），大概也是讓人工智能來做摘要。

所以，學術中的生產、傳播、消費，每一個環節都被掏空了。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是為誰人而做，很多時候只是為了每年的工作評估，就生產一些東西，沒有思考它的意義，而且這種現象還在加劇。但願這只是少數人的行為，只是我們學術產出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我必須坦白說，我不樂觀。

問題不僅在此。真正構成危機的是甚麼？上述例子不只是在告訴我們當今世界存在的問題，更是在告訴我們自身研究的問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得毫無意義。你為甚麼要做一項明知沒人會讀的研究？它不過是你履歷上的一個條目、晉升檔案中的一行文字。如果是這樣，那就真的非常令人警醒了。

我們都知道人工智能本身常常產生幻覺，把自己虛構的文字視作真實。諷刺的是，這種幻覺似乎繼承了某種現代學術生產自帶的幻覺：自以為重要，自以為真實——其實我們跟世界的距離愈來愈遠。

所以我認為，現在確實到了必須認真回頭思考大學應該做甚麼的時候了。這也是為甚麼我認為項飆提出的「共同關切」理念非常重要。因為我真的認為，如果大學還有甚麼值得我們依賴的功能，那就是它應該成為一個生成共同關切的場所——生成問題，把人們聚集在一起，合作思考，探索我們還能做甚麼，找到正確的表述方式。

現在回到黃山提到的關於年輕人的問題。我對從大學一年級到博士的學生都強調：提出正確的問題有多麼重要。這其實非常困難。當你找到了那個

正確的問題，它就像一把鑰匙，你可以用它打開整條脈絡。一旦你提出了正確的問題，世界就會以自己的方式向你的問題展開回應。但如何找到正確的問題？你需要沉浸在具體的處境之中。而大學恰恰是一個適合培養這種能力的場所，讓我們聚在一起，共同尋找那些仍然相關、仍然能推動我們前行的問題。

譬如我之前在一年級的班上設計第一份功課，就是要求學生問一些自己關注的問題，因為整個中學教育都在訓練學生回答已經有範例答案的問題，而人工智能也只會回答用戶給予它的問題。所以，不懂如何找答案不重要，最重要是找自己的問題。但我收到的學生功課很多都在重複他們在中學被老師問過的問題，或者是社交媒體近日的熱話。這我才明白，原來要問一個好的問題是如何困難。對一個十八歲的學生來說，他們可能有很多感受，但無法組織和表達出來，也沒法憑空想像出一個有創意和洞見的問題。所以我覺得要訓練大家問問題，必須提供一些思考的資源，然後再把學生、助教和老師集合起來，一起就着一個社會狀態或文化現象去討論和研讀，才有機會提出一個新的、有意義的問題。

三 當學者進入公共

黃山：兩位的回應讓我覺得，把「留」與「共同關切」這兩個概念並置來看，確實能激發出許多可能。我的理解是，「附近」之所以在中國內地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部分原因在於：附近其實一直都在那裏，只是從來沒有人提醒你去注意它，也沒有人給你一套工具，去理解那些你早已身在其中的經驗。項飆的工作並不是發明了一個新概念，而是讓我們得以辨認自己早已擁有的體驗，並從中發現問題。

而「留」在香港的語境裏也格外引人深思。過去這些年，香港經歷過一些情感上非常深沉的時刻；不少人曾在各種危機感中，用各種方式「盡力」地做事。相比之下，此刻或許恰恰是「留」的時刻——它邀請人們更耐心地去分析、感受、連結，嘗試未必在以往的政治文化想像之內的有關「改變」的思路。

這就引出我的第二個問題。兩位是很不一樣的學者，面對很不一樣的公眾，對「介入」的選擇和方式也不盡相同。正如項飆所言，你的一些公共寫作和發言已經溢出了原有的場景，甚至脫離你的掌控，成為公眾用來理解生活、建構意義的工具。這當然是巨大的成就，不過我想問：你認為這種工作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廣？它似乎依賴一種你身上相當罕見的稟賦——用一種既有智識分量、又能引起廣泛共鳴的語言向公眾說話。你認為這是其他學者也能做到的事嗎？

(一) 遇到問題，就一定要正面迎擊嗎？

項飆：首先，我覺得「留」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概念。我在想「留」的反面是甚麼？「離開」當然是最明顯的對立面，但「單槍匹馬地向前衝」也是「留」的反面。這一點意義重大，因為我們通常（至少我們被教導的是）遇到問題就正面迎擊，然後找到解決方案。所以我們看到「問題」，往往採取一種頗為對抗性的態度。但「與麻煩同在」或「與困難共處」的意思是：第一，我們不逃避。第二，我們也承認，事情或許並不那麼容易解決；而且，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向前衝、想要消滅問題，那恐怕適得其反。因此，我們也必須學會與問題同在，在共處中逐漸重塑甚至重新定義那個問題。所以這不是被動地接受一切——當然不是；而是用另一種方式慢慢地改變，所以「留」其實是可以非常賦權的。

關於工作方式的問題，我的回答是：這並非甚麼不尋常的事。我的做法完全可以適用於任何人。而我們最需要做的是「去學習」（de-learning），也就是把以前學過的那套正規學術的東西先放下。

我們之所以覺得用平實的語言、在保持智識嚴肅性的同時說出能引起公眾共鳴的話很難，無非是因為我們學了太多形式化的東西。我們的頭腦和舌頭已經被那些金光閃閃的概念鏈條和理論框架鎖住了。你不能唱歌了，不能起舞了，因為你的身體已經被學術訓練固定成一個模樣。而學術界認為，只有用某種特定的方式表達才算重要；要是你談的是「我今天早上覺得這樣或者那樣」，那就不是嚴肅討論。



項飆教授認為，必須學會與問題同在，在共處中逐漸重塑甚至重新定義問題。（圖片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提供）

可是，這個世界恰恰就是由你和我昨晚、今早的這樣或者那樣的感受所構成的。我們自身的經驗是首要的現實。我的責任、我的職責，是把自己的經驗當作這個真實世界的一部分，極其認真地對待。當然，作為一個以研究和寫作為業的人，我有一份回應這種職責的義務：去闡明（articulate）個人的經驗如何作為世界的一部分，同時也參與着世界的演變。一旦你擁有了這個視角，我認為其實不難做到把理論分析和公眾對話結合起來。

我們身邊就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比如你去看藝術家，或者做田野調查時遇到的人。每到一個村莊，你都會遇到一些人，他們能給你講各種引人入勝的故事，講他們的生活，而且講述的方式讓你覺得既迷人又深刻。這種迷人不僅僅因為細節本身

新奇或刺激，而是因為那個人對細節的講述，讓你看到事情是如何在歷史中發生的。它們並非隨機出現，而是與過去的事、與更大時空尺度上的現象相互關聯。那樣的敘述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讓你在很具體的經驗裏辨認出一個世界來。

問題恰恰在於，受過教育的人，反而容易失去這樣的講述能力。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在想，我們能不能發展某種更具解放性的教學方法？我們要培養的能力，或許就是一種「留」，意思是那些值得分析的內容本來就內在於我們每個人，我們應該正視它，而不是急於將它取代。我們不要逃離內在、本能 (innate) 或者即時的感受，而是應該「留」在它們之中，嘗試看見那些感受背後更深層的歷史和結構。

(二) 香港需要公共知識份子嗎？

黃山：我想從香港的角度問麗君幾個問題。「共同關切」這一方法，在香港是否同樣可能、又是否有必要性？還是說，香港的處境需要其他方式，去連接大學、公眾與知識界？和項飆相比，你似乎對「直接的公共介入」更為審慎。能否多談談你如何理解這個選擇？在「留」的框架下，一個身處大學的學者，怎樣才算得上是「行動」？

彭麗君：我想黃山其實是在問我：為甚麼我不像項飆那樣更多直接公開參與？這當然有性格的因素。我覺得我就是比較內斂。有些人做得比我好太多了，面對公眾其實需要很多勇氣和能力，我就是做不到——太嚇人了。

但我覺得這也跟香港有關。我一直在香港，所以香港就是我的場域。我認為香港真的不需要公共知識份子。很多香港人教育程度夠高，也足夠自信，只要有資源去獲取資訊，再有一個讓大家安心討論的地方，他們完全有能力自行判斷。我們不需要有人來告訴我們「你們是誰」、「你們該做甚麼」、「你們需要甚麼樣的觀點」。我認為2019年之後尤其如此，那是很多人對「公共知識份子」這個角色祛魅的一個分水嶺。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讓我再舉一個例子，同樣也是觸動我們內心的。過去幾個星期，我們一直在關注大埔宏福苑火災調查的聽證會，特別是那些受害者在法庭上的陳述。當然，這不是直接聆聽，而是通過記者的轉述或者之後的訪問。我不知道你們的感受，但我個人非常觸動。他們其實都是普通人，是你在茶餐廳或地鐵裏會遇見的人，並非甚麼精英階層。我不知道他們的教育程度如何，也不知道他們是否以知識份子自居，但他們有能力清晰地、理性地、有條理地表述自己的想法、關切、經歷，以及對公義的訴求。即使他們是受害者，也沒有被情緒所淹沒，說出來的看法反而非常清楚、直接。

這些就是我們身邊的普通人。他們完全有能力說出自己想說的話，並解釋其理由。這些東西或許才是對我們、對這座城市更有價值的。所以我認

為，我們在香港要守護和推動的，是這種公共的、集體的智識 (public/collective intellect) 以及專業精神。

這對當下的香港乃至全世界都很重要：讓各行各業的人能夠繼續堅守自身的專業知識與判斷，不輕易被其他力量左右，持守他們所相信的原則。唯有如此，社會中的信任才得以維繫；人們也才能相信，掌握特定知識與經驗的專業人士，有能力作出值得信賴的判斷。以新聞工作為例，我們應當讓記者保有他們的專業精神，鼓勵他們做更多深度報導，告訴我們他們基於調查與判斷所認定的真實，而不是讓所有人在眾說紛紜中各自摸索。我認為，這正是我們此刻尤其應該珍惜的。

四 大學應該培養「精英」嗎？

黃山：你們談了各自為何以不同的方式與公共生活相連，很有啟發。我想，你們的共通之處在於：我們並不需要那種單方面向公眾宣布答案、提供行動指南的「公共知識份子」。相反，知識工作者的公共性或許更應體現在：就某些具體的問題，嘗試與公眾共同思考和行動。這樣的「介面」(interface) 其實有很多可能。我覺得去創造這些介面本身就應被當作一項嚴肅的工作。

麗君剛才提到，香港有許多專業人士；我想順着這一點，轉入下一個問題：關於「精英」。其實在過去幾個月，我們為了準備今天的對談，有過幾次交流。麗君曾提出，大學在維繫優績制 (meritocracy) 方面仍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大學應當保持比社會領先幾步的空間——不是簡單地回應即時需求，而是拓展視野。項飆在《把自己作為方法》一書中曾經說道，自己走入社會研究的道路，是被一種反精英的衝動所塑造——抗拒高談闊論的設計，偏好一種更為嵌入的方式來參與社會生活。但我也注意到，項飆同時主張，大學也應當是一個保護「例外」的空間^⑥。

從這個意義上看，你們之間存在一種有趣的交匯：你們似乎都為大學教育中某些形態的「精英主義」(我們暫且用這個詞) 保留了空間，前提是這種「精英」不是掠奪性的，而是能作出某種貢獻、承擔相應的責任。那麼，我想請問兩位一個或許有點尖銳的問題：在當前條件下，大學應該培養怎樣的「精英」？這在你們各自的語境中，面臨着甚麼挑戰？

項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大學裏，每個人都會站出來說：「我要平等主義」，我們有時自動地把精英主義視為壞東西。但政治經濟學的現實就是：大學是一個精英建制。我們在高等教育機構工作的人，都是享有特權的。如果否認這一點，那就很虛偽了。而且，家庭為子女教育投入那麼多金錢，最大的心願就是讓孩子成為精英的一員。如果我們否認這一點，那是不負責任的。

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它涉及到不少人自相矛盾的社會意識，我把它叫做「等級化的平等主義」(hierarchical egalitarianism)。許多年輕人會說：不平等太糟糕了，我的整個人生完全被不平等所塑造。我出生在哪種家庭，基本就決定了我一輩子的命運，因為整個社會就是在不斷複製不平等。所以他們對平等主義有非常強烈的信念，甚至強烈到有一種宿命論的感覺，覺得自己的命運在出生之前就被決定了。但當涉及教育體制和社會結構時，他們對等級秩序的存在又不覺得有問題。比如他們會說，中大比其他大學好得多，因此理應獲得更多資源；對大學、公司的排名津津樂道。總之，他們一方面覺得社會的不平等是壞事，但另一方面又覺得社會應該有不平等的等級結構。

如何理解這種現象？首先我覺得這種矛盾意識是有其合理性的，它點出了人類社會中物質分配的平等和價值批判的等級之間的張力。物質分配應該盡量平等，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等級是人類社會運作所需的一部分。比如教育本身在定義上就是一個等級：從小學到中學到高中到大學，是一個逐步積累和提升的過程。如果否認這一點，一切都無法安排。等級其實反映了一些共享的價值。甚麼是價值？價值就是我們區分世界萬物的方式：某些東西比另一些好，某些德行比另一些品質更被珍視。沒有等級就沒有價值判斷了。

現在的問題是，等級愈來愈被機械化地衡量，與資源分配、權力分配掛鉤，並不能完全反映我們真正珍視的價值。比如我們講最好的大學，並不講它們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社會作出了甚麼貢獻，而是講它們在即使沒有甚麼貢獻的情況下也可以拿到多少資源。學者也是這樣，在個人履歷上要突出自己拿了多少經費，也就是花了多少錢，而不是強調解決了甚麼實際問題。精英大學和學者之所以拿到這些資源，是因為各種各樣的光環，也就是各種其實沒有太多實質內容的象徵符號。大家認同這些象徵化的等級，是因為希望社會有一套共同的價值，分出甚麼是好、甚麼是不那麼好。但是大家對親眼所見的不平等又深惡痛絕，對擁有資源的人把握一切覺得毫無辦法，所以要借絕對的平等主義話語來表達這種痛恨。他們往往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竭盡全力在等級中往上爬，這樣又強化了現在的體系。

回到黃山的問題，既然大學是精英建制，那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精英應當承擔怎樣的社會功能？費孝通晚年曾反思「士」的角色。他說：「士，是玉，不是石頭。」^⑥一個人要成為「士」，就像在石頭上雕琢。這個說法很有意思。玉不是對石頭的簡單否定，而是一種揚棄，或者說超越式的否定(negation)：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塊石頭，通過用心地打磨，石頭都能成為玉，但是必須長期打磨，才能成為玉。所以玉凝聚(crystalize)了石中已經存在的品質。石也因此可以仰望玉，由此獲得方向感，生命力得以勃發。玉和石之間有等級關係，但是玉的等級比石高，是因為玉在代表石，而不是在否定石、奪取石的資源。所以我們傳統上很強調「君子固窮」。玉是要比很多石頭更加貧困潦倒的，但卻是受到尊重的。

這些想法在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絕對的平等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會剝奪我們的價值判斷；我們需要價值判斷。我們真正應該反對的不是精英本身，而是要弄清楚精英的社會基礎究竟是甚麼。如果我們的大學可以做到固窮、又能引領社會，那就是培養了真正的精英。

彭麗君：這是一個很美的思考教育的方式，非常個人，也非常有意義。回到黃山的問題：大學應該培養甚麼樣的人。我們可以回到公共人文學的語境來想這個問題。我們一直在反覆思考，希望給學生提供怎樣的教育。在某種意義上，公共人文學並不是要把他們訓練成傳統意義上的專業人士，儘管繼續堅守受人尊重的專業精神非常重要。我們試圖做的是，在困難中摸索（meander）出路。我不希望把個體訓練成僅僅專注於自身專業的人。我們想培養的，是那些能夠製造連結的人。

不同的學科、不同的專業學院已經在培養大量的專業人才。但我認為，我們同樣需要那些能夠將這些不同的專業人士連結起來的人——讓他們坐到一起，談論共同關切，而不是讓每一個議題只被單一視角所主導。

比如在香港，幾乎所有最優秀的中學生都想去讀醫科。這不單是社會層次上的資源錯配，對這些學生長遠的發展也不公平，其實以他們的志趣和能力，可能在其他方面發展會更有滿足感。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面對如此多彼此糾纏的問題，每一個都有許多不同的源頭。我們當然需要各個專業領域有扎實功底的人才，這極為重要；但我們同樣需要能夠建立連結的人，讓不同專業的人走到一起，理解彼此，提出正確的問題，合力面對複雜的狀況。

我確實認為，大學仍然是能夠做這件事，也是做這件事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項飆的看法，我們需要一種新型的「精英」，不再是那種壟斷一切榮耀和社會利益的精英，而是能夠更積極地提問和尋找解決問題的渠道。我想這正是大學應該塑造和啟發人的方式：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五 不確定年代中的「生命力」

黃山：請容我先簡單回應一下，我覺得你們其實點出了兩個問題：第一，我們一想到「精英」，往往會把他們想像成一種「離公眾很遠」的形象，但這種想像本身是有問題的。項飆用玉與石作比喻：玉「脫胎」於石，卻不能「脫離」石；而在麗君的講法裏，大學要多培養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而是站在民眾和不同專業群體「之間」的人。第二，你們的發言也提示我們繼續思考，無論是「脫胎」還是「之間」，我們都需要重新想像，和這些不同的位置、姿態相關的「能力」又意味着甚麼？或許，更加多樣化的關於能力的想像，也能鬆動社會對等級的固有認識，乃至一定程度回應教育中的不平等問題。相反，追求成為過於同質化的精英，顯然會削弱年輕人自身的生命力。

我想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也與「生命力」有關。我注意到，兩位近期的研究旨趣有一個耐人尋味的交匯：都指向「生命／生活」(life)或「生命力」，儘管切入點很不一樣。最後想請兩位簡要談談：你們如何理解這組概念？在你們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中，「生命力」的意義與價值又何在？

項飆：首先，我覺得你對精英問題的回應非常重要。社會結構幾乎不可避免地是等級化的。但等級應當是我們共同生活、共享某些價值的反映。如果一個社會按照精密的等級來競爭和淘汰，人人都想登上頂端、鄙視底層，那就出了大問題。

在傳統中國，鄉紳是鄉村的精英。但並非人人都想成為鄉紳，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這個抱負，因為那需要多年的刻苦修煉。而鄉紳深深嵌入社群之中，代表的是公共精神。社群因此讓他們調解糾紛、主持禮儀，等等。所以值得深思的是：不是人人都想成為精英，精英是在特定文化秩序中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的。今天的問題在於，精英被高度工具化了——金錢、權力、地位和某種生活方式。人們只是想成為精英，卻不認為精英代表着人性價值。

現在來談「生命力」。我用的是“life power”而非“force”。“Force”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概念，是牛頓(Isaac Newton)物理學之後的概念；而“power”是一個古老得多的概念。我的理解是：“force”更像是一個外在的、作用於物體的東西；“power”則更具內在性：他人可以對你施加權力，但“power”是你可以積累、培育和轉化的東西。

「生命力」這個概念，坦白說目前對我來說還不是一個很成熟的概念，但它源自我對教育的思考。有一個學生曾經問我：「我們學習這麼辛苦，學校為甚麼不給我們發工資？」這是多麼精彩的一個問題。第一，他不把學習看作一種樂趣，他把學習看作勞動，跟去工廠做工一樣。第二，他感覺到學校從他們的辛苦中獲益。第三，他順理成章地問：我按照你們的管理和指令完成了我的勞動(他說的是高中)，而你們也從我身上獲益，因為我考了高分，提升了學校的形象，校長和老師也從學生在考試中的優異表現獲益，那你為甚麼不付我錢？

這個問題讓我開始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教育中的這個政治經濟學問題？教育顯然是一個學習和吸收的過程，但同時學生也在大量地向教育系統輸出。輸出的是甚麼？你可以說那是「勞動力」，但我覺得「勞動力」不夠充分，因為學習不僅是身體上的付出，還有注意力、情感的投入。結果也不僅是物質的或身體上的疲憊，而是經歷多年學習後的某種心理狀態。

所以我想用「生命力」這個概念來描述學生在教育系統中被攫取的東西。更廣泛地說，我認為「生命力」是一個與我們所有人相關的概念。在社會中最珍貴的資源是甚麼？是你和我的精力、注意力和情感投入。這就是我們的生命力。社會的組織方式，其實就是我們在用甚麼方式運用自己的生命力——你想把更多時間花在A上，還是覺得B更值得關注？這會產生深遠的後果，無

論在物質還是情感層面。我也想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拓展到這些非物質的面向，去思考社會和經濟可以如何被重新組織。

彭麗君：項飆對「生命力」的討論是不是更接近福柯 (Michel Foucault) 意義上的「生命權力」(biopower)？我想到電影《黑客帝國》(*The Matrix*, 1999) 裏面，每個人都得變成電池去為資本主義供電，你說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項飆：「生命力」在某種意義上是「生命權力」的反面。它是一個以個人為中心的、內在的力量，而「生命權力」是一個統治者視角的概念。所謂生命權力，就是人口的生產力。統治者為甚麼要提供公共醫療和基礎設施？因為他們想讓農民生產更多，農民受到更好的教育，統治者可以更有效率地運轉社會。這是統治者想要攫取的生命權力。生命力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東西。統治者可能既要攫取生命權力，也要攫取生命力。所以我們對自己的生命力的把握——我對生活的感受、我想追求甚麼——是應對生命權力的一個方式。

彭麗君：對，資本主義就是這麼運作的，通過攫取生命力而繁榮。我在這個學期的研究生專題研習課上就集中討論了相關問題。當這個世界日益科技化，生命體和生命力有甚麼意義？我們看了不少史賓諾沙 (Baruch de Spinoza)、柏格森 (Henri Bergson) 和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的相關著作，黃山也在這個研習課上，為我們提供很多有分量的思考，當中的討論非常虛，如項飆所言，也太精英化了。但我覺得有一點還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設計這門課時的一個指標，就是把「成為」(becoming) 作為一個思考方向。生命其實就是不斷在「成為」的過程中，除了死亡外，不會停止，也就是說「成為」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果。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思考，尤其是在我們所處的這種無望感之中，以及在民粹主義的種種誘惑之下。

我不知道你們有怎樣的感受，但我覺得今天香港以至全世界的很多年輕人，都面對着一個極其不確定的世界。正如我剛才所說，科技在飛速推進，地緣政治瘋狂得令人難以置信，動盪無處不在。重點是，當今的年輕人已經無法規劃自己的生活，不像我們那一代人，天真地以為只要往前走，生活就會愈來愈好。對很多人來說，疫情時期就是一場噩夢。你甚至無法預見明天會發生甚麼。到了今天，很多人擔心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會不會毀掉整個伊朗文明？明天可能又會有新的敵人。這是歷史上一個非常不安的時刻，而且可能會持續變得更加不安。

那麼面對這樣的處境，尤其作為年輕一代，我們能做甚麼？在某種意義上，或許就是我們仍在活着這件事本身。在一個我們似乎無法再看穿，同時我們仍然相信着某些東西的世界裏——活着對我們意味着甚麼？這就是我對「生命」這個概念產生興趣的原因。特別是跟全球政治相關，各種國家政治、各種國家機器愈來愈焦慮地要掌控個人的生活，要維護國家安全。「安全」已

經成為全球通行的熱詞，不只是某一個地方的問題。但當安全壓倒一切的時候，如果我們還想感受自己的存在，我們還能抓住甚麼？生命總會帶來破壞，帶來不安，面對生命，我們就總得冒點險。不安全其實才是生命體的共同經驗；要對生命負責，我們就要拒絕一個沒有風險的世界。

六 觀眾提問及回應（摘錄）

黃山：非常感謝。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充滿挑戰的時刻。一方面我們是幸運的，我們不在戰區之中；另一方面，我們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在地困難和挑戰。現在開放提問。

（一）附近與信任、作為見證的大學

提問一：我有一個關於「附近」的問題。我們的直覺常常是，「附近」可以建立信任，面對面的互動可以建立信任。但甚麼樣的信任是「附近」建立不了的？比如在香港，儘管我的附近有些靈活經營的藥妝店，零售方式很靈活，但我依然會去那些更標準化的品牌店購物。另外，我覺得「附近」更像是一個橫向的概念，但當涉及社群與等級化的機構（比如政府）之間的關係時，那種信任似乎是相當脆弱的。所以我很好奇，「附近」不能解決的是甚麼？

提問二：我是中大畢業生，過去在崇基學院剛好讀的是宗教研究，能在禮拜堂裏提問，算是一個巧合吧。我想說，我們都願意相信大學，也談了很多關於大學的使命，否則就不會在這裏了。不過我在想，當今天的年輕人對某些社會事件有所關切，有自己珍視的信念，但卻面臨種種限制時，我們怎麼跟他們說，大學仍然是追問它們的地方？

項飆：幾位的提問讓我很受觸動。你們的問題都非常真誠，不是泛泛地表態，而是看到了事情的具體面向，看到了行動者面臨的困境。我無法作出具體評論，那需要深入了解細節；但我想提供兩個思路。

第一，關於「附近」和信任。我們知道，很多人信任標準化的產品。星巴克（Starbucks）之所以無處不在，是因為人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知道通過它會得到甚麼。可是，對星巴克的信任，並不會讓我更信任生活、更信任這個世界。如果我的生活充滿了像星巴克這樣的標準化商品，確實是很方便、輕鬆，但我並沒有因此更靠近這個世界。

對本地產品的信任則不一樣。這樣的產品水平確實是不穩定的，比如做飲料的阿姨有時候手多抖了一下，或者大排檔的阿叔因為年紀大了，對食材是否新鮮不像他年輕時那麼敏感……這些都會影響出品。但正是這種狀況，構

成了一種「知情的信任」(informed trust)——有些事會出差錯，而你知道為甚麼會出差錯，你因此獲得了一種握在你自己手中的信任。它不會讓生活更方便、更有效率，但你就在那裏，更貼近了現實。所以知情的信任(握在自己手中的信任)和那種純粹作為機制的信任(因為一切都已標準化、你不再需要做任何判斷)是截然不同的。「附近」所能催生的，恰恰是基於對複雜性之理解的信任。

第二，關於大學，也呼應了「留」作為時間性概念的含義。大學作為一個公共建制，其存在的意義之一在於：它比政治更長久、比各種事件更長久。因此，大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見證歷史。

大學並沒有那麼強大。有時我甚至覺得，大學被賦予了過多的期望——在這個或那個政治場景中，它被期待做太多的事。而當它被捲入得太深時，就不再是一個好的歷史見證者了。但無論如何，我們選擇留在這裏，選擇了見證歷史。

我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可能無法立即作出甚麼改變。但我們可以仔細記錄、觀察、思考。思考不會改變現實；不過，它們會在歷史中產生巨大的影響。三年後、五年後、十年後、一百年後……事情會變的。而當事情發生改變的時候，如果我們已經有了那些思考，那麼在可以改變的時機到來時，它們就會發揮作用。

所以我想，我們都面對着深切的困境，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有一種感覺：雖然見證很艱難，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把我從這個見證者的崗位上移開。我站在這裏，堅定地看着這個世界，看着真相。

彭麗君：謝謝項飆。你已經回答了我想說的一部分。我想我們需要非常清晰地意識到：看待世界的視角不只一個。遺憾的是，有太多不同的視角、太多不同的意見。沒有誰能涵蓋所有問題、提供一個適用於所有人的方案。

但更重要的恰恰是信任這個問題。我們的世界(不只是香港，實際上是整個世界)正在遭受信任的危機。不同意見的人之間沒有溝通——你可以叫意識形態，可以叫政治立場，人們就是無法坐在一起對話。比如你們兩位有相同的經歷，但可能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那麼你們能不能坐到一起，開始交談？我確實認為大學應該是做這件事的地方。

正如我說過的，我之所以對「留」這個概念感興趣，恰恰是因為我們所面臨的困境。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不再知道如何前進。既然如此，那就先留下來。我的意思是，我可能永遠無法給你解答，也沒有人能夠解答。但如果我們無法前進，為甚麼不就留在問題之中？

我相信你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非常切實的問題；我們也是。我們可以做的是，投入在問題之中，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它們。通過跟其他人交談，也許就會出現新的思路，超越最初的問題，打開一個新的視野。我知道，我大概沒有直接回答你們的具體問題。但如果可以的話，我想邀請你們回到自己的問題中去，留久一點，然後互相交流，看看能否獲得新的視角。

「留」的力量關於時間，也關於需要在時間中產生的創造力。我想，這也是知識和教育的美，把一塊石頭磨成玉的美。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深呼吸一口氣。世界就在我們眼前，我們能做的不多，但如果我們有投入的決心、留下的勇氣，那麼也許我們就已經在一點一點地回應着那些問題了。

(二) 從自我到社會：超越犬儒的着力點

提問三：我的問題是關於一些更深層的麻煩，它們似乎更加自我，未必有一個外界的抓手。比如說大學生中存在的虛無主義，甚至是存在主義式的困惑。關於此，你們有甚麼建議？

提問四：我想請教項飆老師，也和您剛才談到的價值與精英主義有關。您提到，社會通過價值來引導人。但我也在想，價值並不只是由個人創造的，它同樣是被社會結構所塑造的。今天真正影響人們的，或許不只是他們相信甚麼、想做甚麼，而是社會所能提供的機會與資源已經變得非常有限，替代性的生活方式也愈來愈難以被想像。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想問的是：您提出「把自己作為方法」、回到身體和感受、信任「附近」，這些路徑在今天仍然有多大的有效性？它們當然很有啟發，但我也有一點疑問：這是否過於強調了一種偏現象學的範式，把個體、身體、生活經驗以及共同感受視為某種解放性的資源？我們應該把它們理解為真正的出路，還是更像一種想像模型，甚至是一種安慰性的自我療癒？

彭麗君：首先，我們知道困難，但依然要嘗試尋找改變的可能，犬儒主義是我堅定反對的立場。作為一個學者、一個大學教師，與犬儒主義作鬥爭是我的使命。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愈來愈犬儒了。犬儒主義是你所能持有的最糟糕的政治立場。你可以是左派、右派、藍、黃……但如果你是犬儒的，那一切都完了。世界只會照舊運轉下去。你以為自己很聰明，看穿了一切問題，但你甚麼都不做。我們真的需要回去讀薩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義著作，我推薦你們回去讀。如果你們有問題，我們可以討論。

項飆：這也和麗君剛才關於犬儒主義與存在主義的討論有關，也是為甚麼我會通過「附近」強調真實的、直接經驗性的生命。這其實是對我們自己所處的歷史處境的一種回應。一方面，今天的年輕人受教育程度遠高於以往，已經真正具備思考、質疑和寫作的的能力，很多時候甚至不亞於專業研究者。但另一方面，由於教育體制、媒體景觀的變化，以及其他社會條件的影響，我們的生活又愈來愈被一套相當有限的話語和元敘事(meta-narrative)所主導。這些話語的具體表現看似很多，但它們所能承載的實際價值卻非常有限。

所以可以想像這樣一幅畫面：每一個年輕人的內心都有一座寶庫，裏面裝着自己豐富而敏感的感受；可是當你要表達自己、作出決定、與他人溝通，

或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關係時，卻又立刻感到自己被簡化成一張白紙。人的內心明明有如此豐沛的感受力，但在外部世界裏，一切似乎早已被塑造好、被決定好了。我認為，這正是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個主要矛盾。

我所說的身體經驗、「附近」，以及那些你能親眼看見、也能實際介入的東西，正是想為這一矛盾提供一條可能的出路。問題在於：如何調動我們已經擁有的東西，同時回應那些被剝奪的東西？如何把經驗轉化為表述，把非常原初、粗糙的感受轉化為有意義的經驗？這也是我為甚麼強調這些概念。

那麼，這和犬儒主義有甚麼關係？人們為甚麼會變得犬儒，覺得所有價值都只是空話，最後只是由赤裸裸的等級結構決定一切？為甚麼誰擁有更多金錢和資源，誰就能向前走，並不需要代表任何真正值得嚮往的深層價值？這正是因為，我們內心深處珍視的東西，沒有被轉化成一種實際的力量，使我們能夠用它來塑造自己的環境，甚至介入和改變既有的等級秩序。

從這個意義上說，犬儒其實是一種很複雜的心理狀態：一個人感到自己已經無法表達自己的價值，但同時仍然想留下來、想繼續掙扎、想待在這個遊戲之中。犬儒也是一種「留下來」的方式。所以，我才會強調那些看似非常個人的、個體性的經驗。但最後還有一點很重要：它和普通的心理治療，或者所謂的「雞湯」，到底有甚麼不同？我覺得關鍵在於，在講「附近」和講具體經歷的時候，社會和政治分析必須被帶進來，這樣我們才能把個人的東西轉化為社會議題和共同關切。

註釋

① 〈202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26年7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https://hudong.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607/t20260706_1442870.html。

② Vanja Gutović et al.,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Trends Report: Towards Inclusive, Equitable and 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in an Internationally Mobile Landscape* (Paris: UNESCO; Caracas, Venezuela: UNESCO IESALC, 2026), <https://doi.org/10.54674/IN.2026.94>.

③ Richard Sennett, *The Craftsma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④ Donna J.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⑤ 項飆、吳琦：《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頁204-10。

⑥ 〈費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第28版。

項 飆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彭麗君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黃 山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